

(日) 天野元之助 著

中国古农书考

彭世奖 林广信 译

农业出版社

中

國

古

本

書

考

S-09
10

中国古农书考

〔日〕天野元之助 著

彭世奖 译
林广信

农业出版社

(京) 新登字060号

中国古農書考

著者 天野元之助

発行者 北村正光

発行所 龍溪書舎

印刷所 日本プソントヤンタ

製本所 鈴木製本所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〇日発行

2R5/09

中国古農書考

〔日〕天野元之助 著

彭世奖 译
林广信

* * *

责任编辑 王华勇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32开本 13.75印张 1插页 320千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140册 定价 13.60 元

ISBN 7-109-02151-3/S·1416

题赠《中国古农书卷二

何廉 十二月
一九九二年

弘揚神農故土耕耘農法

繼承華夏農業文化遺產

译者前言

《中国古农书考》是天野元之助先生研究中国古农书三十年的结晶，对农书版本的研究尤为精详。到目前为止，它和王毓瑚先生的《中国农学书录》一样，仍为中国古农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对于中国经济史、农业史、目录学和版本学的研究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早在天野先生和王毓瑚先生健在的时候，国内便曾计划将它翻译出版。为此，天野先生曾把他对本书的“修订意见”寄给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希望翻译时予以修订和增补。可惜翻译出版的计划，因故搁浅，未能实现。此次我们承担翻译任务时，承北京农业大学杨直民教授关照，将天野先生的修订意见复印惠赠，使我们能按照著者生前意见进行订补。此外，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农业出版社的有关同志以及梁家勉、胡道静、游修龄、董恺忱诸先生的鼓励，在某些具体资料的查证方面，得到章楷、王达、姜义安和日本东海大学渡部武等先生的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现将有关事项列述如下：

一、凡著者生前在“修订意见”中作了修订的地方，此次翻译时均按其修订意见译补。由于译补的地方较多，文中不再一一注明。

二、凡原著有错漏的地方，谨就译者所知，酌情予以更正或补充，并以脚注形式注明。

三、凡原著中引用中文文献的地方，除个别无法查对者外，

均按所引文献原文译出。

四、为方便读者查阅，书末附有书名和著者索引。

五、原书附有许多插图，因多系照片图，无法复制，故删去了，是为遗憾。

水平所限，错漏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译者

1989年元旦于广州

天野元之助《中国古农书考》序文

〔日〕东畑精一

天野元之助氏从事中国农业研究，已有半个世纪了。这期间他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们的见识。他的研究不仅传播了中国农业知识，而且对农业研究的一般方法来说，也很有启迪。

他的研究除了介绍农业的真实情况外，三十年来还涉及中国农书方面的文献研究。本书汇集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他的中国农业研究的第二编。

如果从最早的农书算起，中国农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记载了中国几万里辽阔国土所产的多种多样的农作物及其亚种，本书就是其中三百多种农书（从《神农书》开始，时间上从汉代到清代）的解说或解题。经过漫长岁月的传播，同一种书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我认为这是中国古书的一种特色）。而在辗转传抄中，又产生了不少文字脱漏和误写，某些特定文字由于避讳而被废弃，用上了很多讹字，正文和注解被混淆或倒置，而且这些讹误又被流传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哪一种是定本，哪一种应该作为善本，都是难于判定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课题。天野氏在从事中国农业研究之余，把这项工作坚持下来，这确实是一件大事业。

研究古农书并不是把它弄清楚是古老的东西就可以完事，这和今天大多数科学史研究中表现出来的情况一样，是一种富有现实意义的工作。我认为这一点对于中国农业来说，要比通常的场合更有强调的必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的古代农法仍然

强有力地生存在中国现代农法之中的缘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进行过多次改朝换代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却很少引起社会革命。作为国家的支配力量，虽然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等变化，可是这种变化对经济的影响甚微，所以也看不到令人瞩目的产业革命。在各种产业中，旧的东西不但没有绝迹，而是象大河一样长流不息。农法方面更是如此，在这里没有阶段性的进步和技术革新，只有象生物生长那样的连续性推移。宁求安定、平衡，也不愿扰乱、进步。这种情况逐步固定化便形成了所谓农法的基点。因此，一种农法在经过了全面的反复的锤炼，重复了多次试行错误之后，所得到的多层成果，就成为今日的农法。一千几百年前集农法之大成的古书，如《齐民要术》所传的农法，其中大半就是今日华北农法的基点。在这种意义上说，古农书并不单纯是古农书，我认为它确实具有为理解现代农业所不可或缺的一面。

本书不仅仅是图书目录。正如上面所说，要为一种古书确定其定本，是很不容易的。换言之，各种书都有它自身的历史，这部《农书考》就是要把这样的历史讲清楚的书。某一种书的发现史、研究史、辨别各种版本的异同等等，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写成本读物。请试读一下日本人也比较熟悉的若干古书的解题吧。例如后汉的《四民月令》（崔寔撰）、北魏的《齐民要术》（贾思勰撰）、唐代的《茶经》（陆羽撰）、宋代的《农书》三卷（陈旉撰）、元代的《王氏农书》三十六卷（王桢撰）、明代的《农政全书》六十卷（徐光启撰）、清代的《佩文斋耕织图》二卷（焦秉贞绘）等等的解题，全部都是津津有味的读物，对于文献学家来说，尤其如此。对这些不感兴趣的人，我可以说不配称为中国农业方面的研究家。

再说一下本书分册，即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的复印版。王氏是天野氏的多年学友，其《书录》的改订版以及若干补订，

在日本也是难以得到的。由于天野氏的《农书考》避免了与王书的重复，增删了若干书目，补入了天野氏独自的研究成果，所以两者有互相补充的作用。著者为纪念日中文化交流揭开新的一页，而把两书同时出版。

从图书目录发展而来的专科书录解题，可以比作学问领域中的“社会资本”。正如一个国家的生产和生活的提高不能没有社会资本一样，为了深化学问，解题之书也是必须的，它是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的“资本”。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这部《农书考》调查了日本著名的图书馆和文库，详细记载了在什么地方藏有什么书的什么版本。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我举双手欢迎这本书的公开刊行。

著者天野元之助氏是专攻一门的学者，他的研究环境并不好，在漫长的生涯中曾遭遇多次剧变，使他吃了不少苦头。可是他从未中断过他对中国农业和农书的研究工作，而且不断取得进展，直至今天仍在不断迈进中。年纪越大意志弥坚，他怀着“朝夕常清醇，日日是好日”的心情，以研究学问为乐。真是一位令人仰慕的学者啊！

1975年3月

序

承蒙亚洲经济研究所顾问东畑精一以及日本经济协会副理事长渡边弥荣司、新潟大学教授熊代幸雄、农业综合研究所中国室室长山本秀夫、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调查研究员小岛丽逸、日中经济协会调查课课长嶋仓民生诸氏和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调查研究员戴国辉等氏的厚意，并征得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王毓瑚教授的同意，把他所著而在日本难以得到的《中国农学书录》改订增补版，和我的《中国古农书考》，值此日中文化交流展开新页之际，作为两国恢复邦交的纪念物出版。由于得到了新日铁以及日商岩井、伊藤忠、丸红饭田、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的巨额资助，又得到了龙溪书舍北村正光社长、船桥治编辑长和对此书排版费尽心血的日本印刷中心（公司）加藤泰子女士的协助，本书终于得以出版了。在正文已经初校完毕的今天，我正沉浸在为本书写序的喜悦之中。

追忆往昔，我是因为撰著了《中国农业经济论》上、中卷，以及相当于下卷的《中国农业的诸问题》上、下（合计2,173页），而由京都大学授予经济学博士的。又因为写了《中国农业史研究》（954页），而被授予日本学士院奖。而这本《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日中学术交流的献礼，得到了以东畑先生为首诸公的赞同。又由于龙溪书舍、印刷中心作业课诸君的努力，而得以出版成书。这是对我七十多年岁月的莫大酬劳。记得当我执笔撰写《中国农业经济论》时，作为一个满铁职员，在那里一帆风顺地向前直进；可是写这本《中国古农书考》时却处在完全相反的境地，眼前是

一片漆黑的赤色嫌疑和开除公职的恐怖。这本书是当时默默苦读古农书的产物。战后得以归国，先后进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大阪市立大学和追手门学院大学工作，我抓住每一个机会进行写作，这是经过三十年之久陆续积累起来的東西。《中国农业经济论》上、中，是我在满铁工作时期出版的；《中国农业的诸问题》上、下，是在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时出版的；《中国农业史研究》是在大阪市立大学时出版的；这次的《中国古农书考》是在我最后教学的地方，即追手门学院大学时印行的。此书的题签得到原文学部长平泽俊雄教授为我挥毫，欣喜之情无过于此。请允许我在这篇序文中，作为一段追忆，叙述一下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怎样走上研究中国古农书这条道路的。

我做学问的经历

1926年3月，我毕业于京都大学经济系，4月14日接到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大连总公司的聘书，以后一直到1948年7月离开大连回国时为止，都在专心搞经济调查工作。早在中学时代，中国已强烈地吸引着我，从怀德堂的四书朗读，到西村天囚、松山直藏两先生的经书课；在松山高中时醉心倾听重松俊章、今村完道两位教授的讲授。所以在京大虽然专攻经济学，但一毕业我就奔赴早已向往的中国。在满铁调查课时，最初的工作是编辑《满铁第二次十年史》，负责人员编制和地方部的工作。为此，我不但调查了满铁所属的主要城市和哈尔滨，而且对大连图书馆和调查课资料室里有关满洲（现在的东北）和中国经济的书籍，更是如饥似渴地博览不厌。又曾出差，从北朝鲜到间岛（今朝鲜族自治州），到过北满铁路沿线、北京、天津、八达岭，又到过青岛、上海、南京、武汉、香港、广州、澳门等地。除著有《关于在间岛的朝鲜人问题》、《集中于大连的满洲油坊》之外，还对当时中国

进步学者（陶希圣、梅思平、朱其华、王充恒氏等）的论著做过翻译、介绍等工作。1932年2月，满铁经济调查会成立，我当上满州经济组主任之后，定出了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长期计划，开始了对满洲农业经济的研究。同时，对农业劳动力供应地的华北农村，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939年9月开始，我作为留学生旅居在北京一年、济南半年。在北京时，旧书店的人经常来访寓所，打听我的研究题目，并把有关的书留下。一个星期后再来时，便把我不买的书拿回去，而把新的书送来。结果我把王桢《农书》、《农政全书》、《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等等都买下来了，这件事与我日后的研究工作是有联系的。在济南我写了《山东农业经济论》，为了写这本书我曾跑遍胶济、津保两铁路沿线。当我把家属送去大连之后，曾做了一次长途旅行：先从热河的承德出发到北京，再乘京汉线在郑州下车，又乘陇海线访问了西安。1936年11月到上海事务所调查课工作，又曾到汉口、长沙、南昌、杭州等地作调查旅行。上海事变爆发后，曾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在上海、杭州、芜湖之间巡回跑动，又参加了南京的接收文献的整理工作。局势安定下来就进行农村调查、工厂调查、乡镇调查、民船调查、商务常规调查等等。在这期间，我的《中国农业经济论》上、中卷由改造社出版，并迎来了在九州大学、京都大学、东亚同文书院讲授“中国经济论”的光辉岁月。1942年，由于调到大连总公司调查部担任调查工作，所以有机会到华南进行调查。九月下旬到海南岛进行土地常规调查，得到崎虔次郎君的协助，和几个人一起环游岛内，次年三月才踏上归途。

于是，我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也告一段落，下卷的原稿和《农业技术论》也已送去改造社，后因战争情况恶化，下卷的原稿移到了京都，1952—1953年才由东京的技报堂把题目改为《中国农业的诸问题》（二册）出版。但是《中国农业技术论》却在东京遭到战争灾害而烧去了一半。

与此同时，我的一帆风顺向前直进的调查生活，到了战争末期也遇到了倒霉的结局。我们调查机关的进步同事，被当局进行了四次赤色开除的迫害，我自己也在加入公司的第十七年，即1943年9月由新京宪兵队指令逐出了调查局，我考虑到今后的出路，向大连图书馆要了一个小房间，使自己成为一个只管翻阅古农书而不管世事的人。

接触中国古农书

满铁大连图书馆有丰裕的资金，并经学者松崎鹤雄氏之手蒐集收藏了数量庞大的古籍。我以金陵大学毛骝、万国鼎编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为指南，将馆内所藏中国古农书搬到我的小房间，用原稿纸作了摘记，进行分类整理，并开始做农书的解题。我读解古书的能力较差，只好多花一点时间，研究一种书的时候就去查阅同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版本，并常常从中找到解决疑难的方法。于是，比较、核对各种版本的校勘工作便成为我最关心的事情。我就是这样边涉猎丛书和各种版本，边把心得笔记积累起来。生活方面仍由满铁负责供应，没有被禁止外出，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到外面出差。

对摆满在图书馆小房间书架上的中国古农书接触多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被发掘出来，例如在后出的书中有随意抄袭前人著作的地方；有些虽然列出了引用文献，但究竟哪些是引文，哪些是新添加的部分等等。这些问题只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就能够逐步查对出来。与此同时，还能探索农业技术发展的过程，因而新的强烈的兴趣又涌现出来了。

在涉猎农具图的时候，由于元代王桢《农书》登载最为丰富，所以我集中精力研究了此书。又因各种版本所载的绘图差异甚大，所以我找机会到奉天城（今沈阳）内详细查看了文溯阁珍藏

的《四库全书》本。

这样从农书的研究到中国农业史的研究过程中，我深感学习社会经济史的必要，因而当初想搞古农书解题的想法又被搁置到一边去了。

1948年7月离开大连回国的时候，幸得女儿们的留意，把我积累下来的原稿带回来了。同年11月，我作为京大人文学研究所的成员，得以继续进行这项研究。一有机会我就研究收藏在日本的中国古农书，常常到“凡例”中提到的图书馆、文库和研究机构进行阅览，同时从各种刊本、抄本中把必要的资料一一摘抄下来。我的有关农业史的论文，承蒙加用信文、熊代幸雄两君安排，由农业综合研究所于1962年3月以《中国农业史研究》之名出版。在古农书研究方面，我用多年时间写完的《元代王桢〈农书〉之研究》（载《宋元时代科学技术史》，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1967年出版，341—468页），是我在版本研究方面下了踏实工夫的成果。同时，在崔寔《四民月令》、韩鄂《四时纂要》、陈旉《农书》、《农桑辑要》、《农桑衣食^①撮要》、《种树书》、《便民图纂》、《农政全书》、蒲松龄《农桑经》等书的研究方面，也开辟了一条我自己的路。

版本比较的成果

我对版本发生兴趣的诱因，是在大连时为了查明农具“耨”的字义，翻阅清代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第十四篇上，看到金部钁字的注文是：“古耨草坐为之，其器曰耨，柄短”，再查汉代刘熙《释名》卷四《用器》和清代王谟校《汉魏丛书》所收《释名》，其解释是：“耨似锄，以耨禾也”。在这里耨和锄究竟有什么不

① 天野原书作《农桑衣食撮要》，应为《农桑衣食撮要》。

同，从文意上无法理解，后来再翻《四部丛刊》所收《释名》及清代毕沅《释名疏证》（收在《经训堂丛书》中），看到的是：“耨似锄，姬（女人弯着腰）薅禾也”^①。由此可见，王谟《汉魏丛书》所收的《释名》不但缺了“姬”字，而且连空格“□”也没有留下。所以我痛感选好版本是多么重要！

下面再举出我对中国古农书的版本极为敏感的若干事例：唐代陆羽的《茶经》差不多有三十种刊本，其中最古而又可信的宋代左圭辑《百川学海》（影宋咸淳本）所收《茶经》“九之略”，第二十五个字有一个墨钉“■”。这个缺字在汪士贤校《山居杂志》、胡文焕辑《格致丛书》、喻政辑《茶书》、郑煜校本张海鹏辑《学津讨原》、大典禅师《茶经详说》中都作“炆”（焙烤），而涵芬楼藏明钞本《说郛》、陶宗仪辑陶珽重校《说郛》、明阙名辑《五朝小说》所收的《茶经》都作“复”字（用“炆”字较好）。我又翻阅过奉天（今沈阳）文溯阁《四库全书》本的《茶经》三卷，发现“三之造中”缺了“如胡人靴者戚缩然”八个描写砖茶形态的文字而感到惊奇。这可能是因为忌讳“胡”字而删掉的。同一天，我看到雍正四年铜活字精印的《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茶部汇考中引用的《茶经》，同样也因忌讳而删掉了“胡”字，而且还有五处出现错字脱字。这些在我的笔记中都可以看到。

又《南方草木状》也有近二十种刊本，我选用上述咸淳刊《左氏百川学海》癸集本。但195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南方草木状》是根据吴江沈氏怡园校宋刊本，复核改正了若干错字，同时收录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所藏缺名画家所画的《南方草木状图》六十幅。这是描绘得很好的草木图画。明代弘治刊的《百川学海》（癸集）本卷下有四个墨钉（应为“实”、“条”、“贵人”四字）。此外，明代何允中辑《汉魏丛书》（载籍）本、重编《百川

^① 宣统三年上海大通书局本作：“耨，以锄耨薅也，姬薅禾也”。与此所引不同，未明天野先生所据何本。

学海》(辛集)本(两者板片相同),卷上最后处“凡草木之华者”云云四十二字是刻低一格的,在这一点上比咸淳刊《百川学海》本为整齐,但卷下海梧子^①条中有下列二十五个缺字(兹用咸淳刊《百川学海》本填补如下):

海梧子树似梧桐,色白,叶似青桐,有子如大栗,肥甘可食,

出林邑。海松子树与中国松同,但结实绝大,形如小栗,三

角肥甘香美,亦罇俎间佳果也,出林邑。

这本书的总目里也只有“海梧子”而无“海松子”,其实是“海梧子”的说明文字和“海松子”的小标题一起脱漏了,而“海松子”的说明文字却被混为“海梧子”的说明文字。

不仅是文字有差异,而且还有改变文章体裁的情况。宋代宋祁撰的《益部方物略记》一卷,纪录了四川的草木类五十一种和若干鸟兽鱼类。毛晋辑《津逮秘书》本采用首先登载说明文字,第二行才举出名称,然后附以小字注的形式。但重校《说郛》本却采用先举出名称,小字注部分改为大字续上,最后才登载开头的说明文字的体裁。现以前书存有空格的“瑞圣花”的记述为例:

○ 《津逮秘书》本:

众跗聚英烂若一房有守绘图厥名乃章繁而不绝是异众芳

右瑞圣花 出青城山中干不条高者乃寻

丈花率秋开四出与桃花类然

数十跗共为一花繁密若缀先后相继

未萎也蜀人号丰瑞花故

程相 之 图以闻更号瑞

圣花然有数种其小者号宝仙浅红者

^① 天野原书作“海梧木”,应为“海梧子”。